

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当下,越是低端的院校,越无所谓考生的高考成绩。那么,什么才是这类院校应该关注的呢?是否又意味着现行的三本及以下院校的招生录取方式,应该重新思考?

三本需要“独特存在”吗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考招生渐近尾声,相比高分考生冲刺北大、清华的紧张心情,其他分数段的考生心情也很复杂。尤其是高考成绩介于两个录取批次之间的考生,他们可谓“高不成,低不就”——成绩达到更高批次的录取线,但未必就能被该批次录取。其中,又以分数达到三本院校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最为典型。

“这样的学生最难作出选择,因为三本院校学费高昂,除了能考研之外似乎也没什么出路,找工作时,三本的毕业生和专科生一样待遇,但是稍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不会放着本科不上,让孩子去读专科。”江西省某民办高校学生王志东如是说。

于是,三本院校计划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考生、家长们对其非常谨慎。这又不禁让人反思一个问题——三本批次是否要单独存在?如果把它并入二本,或是并入高职高专,学生的选择余地是否会大许多?

呼声与实践

取消三本的呼声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2013年的一场高校报告中预计,5年内高等教育将取消“一本、二本、三本”的提法,还民办高校以活力。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建议国家取消三本批次,并将该部分计划划入职业教育,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而普工、技工严重不足的局面。

而就在日前,江苏省共11所民办二级学院取消了三本计划,只不过其初衷并非为了发展职业教育,而是为了整顿“校中校”、“假独立”等独立学院转型不合格等问题,其原本的招生计划归于母体二本院校。

取消三本,江苏的例子也许非典型。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将三本批次合并到二本批次录取,如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实行本科重点批次、非重点批次和专科批次录取;一些一本高校放在三本招生的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因办学质量不高,“圈钱”意味浓于诚心办学,正在逐渐“萎缩”甚至被取消。

种种上述做法,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看来,是一种积极的动向。“教育主管部门曾经认为划出多个批次招生,有利于不同层次的院校招收到相应的考生,但实际上高考作为国考,政府给院校分层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三本院校在高考录取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很多民办本科院校招生情况甚至不如高职高专第一批次。”

有关数据显示,2010年之前,三本院校的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2010年开始逆转,多数三本录取率下降;到了2012年,不少三本院校的录取率猛然下降到50%左右。

是否因为考生人数下降、生源危机,促使一些省份做出取消三本招生的举措?别敦荣认为,尽管近些年来三本院校存在明显的生源危机,但



三本招生咨询会现场

图片来源:www.ldzbs.cn

包括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在内的三本院校每年仍要吸纳近百万的考生,因此取消三本招生的做法更多的是为了纠正批次划分不公平、满足考生个性化选择的需求。

彻底放开的可能性

回忆一起等待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王志东想起一件“很有趣”的事——高考成绩越不理想的学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越多。“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居然收到了近40封‘录取通知书’,有的承诺本科文凭,有的承诺免学费,有的承诺包工作……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王志东说。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接到过若干份盖着红色公章、写着录取专业、报到时间的“录取通知书”。后来他才知道,这些来历不明的“野鸡大学”专订成绩差的学生,“都是为了生源呗,野鸡大学的老师也要混口饭吃。”

王志东的理解,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这起码暴露了一个倾向,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当下,越是低端的院校,越无所谓考生的高考成绩。那么,什么才是这类院校真正应该关注的重点呢?是否又意味着现行的三本及以下院校的招生录取方式,应该重新思考?

教育专业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始建于1921年,2011年恢复重建)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建议,高职、专科和三本院校可直接依据学生高中提供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或根据专业设置考查学生的基本技能情况进行录取,不再需要报考三本及以下院校的学生参加统一高考。

中华教育改进社恢复重建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三本以下招生应关注

学生的技能和特殊才能。如此一来,将有约50%的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上千万人的高考变成只有四五百万人参加,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事实上,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学校录取早已是如此,国内一些省份也已经在试行类似的做法,依据考生的高中成绩进行高职阶段的录取。

“允许学生在统一的平台上填报30个志愿,在学校预录取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一个就读志愿。通过学生的放弃实现多样化选择,将使得招生标准就不再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学校说了算。”储朝晖说。

是否“一放就乱”

但凡高教改革,上级主管部门最担忧的事就是“一放就乱”。这似乎成为影响高教改革“最合理”的理由。更何况方案中的改革想法,涉及教育主管部门最关心的办学自主权。现实与否,成为人们最先提出的质疑。

在储朝晖看来,三本及以下院校的招生情况,短期内也许会让人觉得混乱,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而言,“真正吸引学生的是一所学校的特色、优势,办学质量高低与否必然要在招生中真实地展现出来”。

他表示,方案的最大争议来自于“政府是否要完全退出考试、招生”。按照方案,不再有招生计划,而是交由专业评估机构提前半年依据学校的师资和硬件条件确定招生专业及各专业的学位数。“实际上,方案并没有让政府完全退出招生,而是让政府从现有的包揽状态下一步步退出,最后承担监督、服务功能。”

这套由政府发挥监管作用,民间机构发挥主

体作用,学校进行专业考查的新体系,在别敦荣看来,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具有可行性,“减少政府干预虽然是中国教育改革共同的呼声,但如今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敢说抛开政府,能够把涉及千万人口的事情做好”。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参考他国教育制度开出的“药方”,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

“如果一定要让一部分高校不参考高考成绩,自己组织考试录取的话,在中国现在可能只有‘985工程’院校可以这么做,因为它有充分的社会声誉,能够获得绝大部分人的信任,除此之外,其他的院校都存在信任危机,一旦放开,其后果只可能要么走向混乱,要么走向死亡,难有一条光明大道。”别敦荣解释,整个社会把公信力寄托在高考录取上,不参加高考的人被认为水平低、不用高考来招生的高校被视作“野鸡大学”,只有“985工程”院校可以用自身的公信力来尝试做这件事,但实际上,由于涉及最敏感的公平问题,“985工程”院校也不敢贸然行事,其在自主招生上表现出的慎之又慎的态度就是证明。

不参加高考,就一定不能获得社会认可?这个问题现在悬而未决。起码,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就有45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揭晓他们的前途与命运还有待时日。

改革强调公平

尽管在改革方案上有不同认知,但是储朝晖、别敦荣却形成了一项共识,即三本招生改革不是简单化地对院校进行分类、定性,而是应该把多批次院校放在一个平台上,供考生、家长去判断、选择。

行政命令下造成的不公平是显见的。譬如,招生指标。储朝晖表示,各省的招生指标是一个计划中的数字,由省内高校来分,指标倾向高端学校而非低端学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取消计划分配指标,通过核定学校师资、硬件等条件确定招生数,更加符合三本院校招生规律。

别敦荣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不公平”:一是通过行政命令将高职院校人为地划作第四批次,导致它只能招低分考生,而实际上一些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效并不比二本院校差。这对学校而言是不公平的;二是仅仅根据分数将学生放在了不同的批次,有些高分考生即便想选择高职高专,因为不能跨批次填报志愿,他们的求学意愿难以得到满足。这对学生是不公平的。

“现行的高考制度整体上还无须要废除,改革所要做的是另起炉灶,而是取消那些行政性的刚性限制,以及那些导致各种不公平的机制。”别敦荣说,除了“985工程”院校,其他所有院校应该放在同一批次招生录取,“这样一来,三本院校招生就不至于出现‘施施不爱、舅舅不疼’的情况,而所有院校就是‘萝卜白菜’,家长、考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院校的办学质量以及就业认可度来选择心仪的院校,这对三本院校来说可能是更好的出路。”

壹月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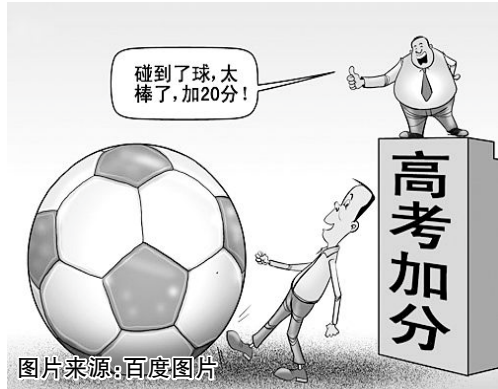
71.3%受访者支持弹性学制

本月初,各高校招生的大幕尚未拉开,但公众对于新学期高校的政策变化已经充满期待。7月1日,媒体报道了一项针对大学弹性学制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有71.3%的受访者支持大学实行弹性学制,其中53.2%的受访者认为弹性学制有必要在全国大学推广。

事实上,在国外高校弹性学制是一项很普通的、且很有效的学制体系。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这也不算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就在一个月前,济南大学宣布,对今年招收的学生将实行弹性学制,而在此之前,国内很多高校都曾推出过以学分制为基础的灵活毕业制度,但这些尝试几乎都无疾而终。

一项好政策,但在国内却难以推行,这样的事例其实在国内高等教育已经不算少数,根源何在?简单地讲——话好听,事难办。

就以弹性学制为例,根据学分情况对学生的学制年限作灵活调整,这条并不复杂的制度原理,在实践中却需要高校内部的教务部门、行政部门、就业部门,乃至后勤部门的密切配合,而在国内高校各个部门条块化分割还较严重的情下,要想实现如此程度的“无缝对接”,难度可想而知。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从根源上说,弹性学制属于一种西方优秀的高校管理制度。类似制度的“本土化”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一些“水土不服”。我们需要在引进制度的同时,通过自身改造,为这些优秀制度在本土的生根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否则,再耐活的“树种”也会枯死的。

辽宁 270名考生放弃体优生加分

本月初,作为曾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辽宁本溪高中高考考生体育加分造假事件的后续,辽宁省教育厅体优生高考加分问题联合调查组在7月5日公布,全省1072名高考体优生中,有802人签订了《诚信承诺书》,270名考生放弃加分资格,他们将按取消后的成绩参加高考录取。

首先明确一点,270名考生放弃体育加分,并不一定代表这些考生一定存在造假行为;而另外802名签订了《诚信承诺书》的考生,也不一定全部是“干净”的。此事件在事实层面,其实意义不大。

但是,辽宁考生造假事件对我们的启示乃至“震动”却着实不小。虽然之前公众也报道了很多高校造假、替考等事件,但其规模和公众关注度,与此事件都无法相比。而更可怕的是,相信大部分公众在关注此事件的同时,都不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一事件是孤立的吗?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你懂的。

需要注意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高考改革都在一直朝脱单一考试模式,强调综合素质考查的方向迈进,而公众对此最大的疑虑便是公平性问题。我们需要强调效率,但公平性必须是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在踏步向前的时候,需要停下来,看看我们的路走得直不直,稳不稳。

本科体育课不少于144学时

就在辽宁省270名考生放弃体优生加分后的一天,又一件与体育相关的事件被报道出来。7月6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要求保证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144学时(专科生不少于108学时)的体育必修课,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第一感觉会是“似曾相识”。因为在此之前,教育主管部门已经针对学生体育问题,针对各级学校(主要是中小学)下发了多份文件,要求保障学生的体育时间。而这些文件中,两个最常见的词汇便是“保证”和“不少于”。

然而,这些文件的效果并不明显,学生的体质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是政策还不“到位”吗?

当然不是。我们的相关政策已经足够繁杂,但是这些政策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它们几乎全属于“过程性”政策,即只规定了“你必须怎样做”,而不是告诉“你要达到怎样的目标”,当我们依然用考分和就业率衡量一个学生乃至一所学校的成功与否时,缺乏对结果标准判定的制度,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华中农大思修教师打出 91个零分

7月20日,随着当地媒体的一则报道,华中农业大学思想品德修养教师李厚刚成为了“名人”。这源于他的一次打分——期末考试中,他给91名存在抄袭现象的学生打了零分。

老师给抄作业的学生记零分,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小学,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吗?为什么到了大学,一个给零分的老师就成了“异类”呢?

原因似乎不在老师身上,因为李厚刚只不过是履行了一个老师的正常权利,原因好像也不在学生身上,至少不全在学生身上,因为他们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就知道思政课是用来“混”的,就知道零分在思政课堂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问题出在哪呢?除了我们颇有些形式主义的课堂教学模式,除了“严进宽出”的高校整体教学体制,除了高校对于非专业课普遍的漠视态度,我们还能找到其他原因吗?

中国大学评论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约9300万元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来自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拿自己挣的钱捐资,不管捐给谁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大学,其实是质疑错了对象。他们应该质疑的是,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

大约在四年前,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是时,这件事就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他的中国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了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完全一样。稍微有些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为何赚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

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的慈善捐赠环境,那么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是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的。一个成熟而理性的慈善环境中,首先应该得到尊重的,就是捐赠者的个人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获得捐赠,这不是通过指责捐赠者不爱国就能解决的,而应该反思我们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

事实求是的说,相比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的确很不到位。目前,我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而并不重视社会募捐,即使是获得社会募捐,在回报捐赠者以及用好募捐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经费不透明等。而在国外大学,通常会设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也有着一套相当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

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都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也不会担心自己的捐赠不被用到“刀刃上”而被挥霍掉;反观我国的内地高校,由于本身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给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诸如“中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有多少人认为中国大学缺钱,因为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本已十分紧缺的经费吗?

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某所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有一天成名就后,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会采取扣押毕业证书的方式,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归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地关注母校的发展?

而在美国大学,学校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即使在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尊重捐赠者的权利,与尊重学生的权利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国社会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也只有每个办学者都能真正地尊重学生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不客气地说,我国当前的办学,并没有一心对教育负责、对学生负责,而只是对政绩负责,我国大学在给学生奖励助学金时,还采取“评议助学金”“竞选助学金”等侵犯贫困学生人格尊严的做法,这都伤害大学的形象,但大学却没有采取措施扭转。这样的大学,能获得社会的捐赠吗?

中国大学为何难获企业家捐赠

熊丙奇

(陈彬)